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综合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综 合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5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ISBN 978 - 7 - 5095 - 1486 - 3

I. 1… II. ①中…②中… III. 经济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IV. F1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6279 号

责任编辑: 张 铮

责任校对: 杨瑞琦

封面设计: 陈 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50 印张 1 280 000 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486 - 3/F · 128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房维中			
主 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毛福民	杨冬权
副主编	董志凯 (常务)		武 力	徐建青
	段东升	李明华	李和平	杨继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洛林	王晓峰	石建国	史纪辛
	刘国光	刘美玲	刘贵贞	许 虹
	许卿卿	曲 韵	陈廷煊	李小宁
	李应和	李和平	李明华	武 力
	杨冬权	杨继波	段东升	赵月琴
	赵学军	贺德海	郝和国	姜长青
	徐建青	程连升	董志凯	

总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 21 世纪初叶，面临全球化、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抚今追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正是来自这一宗旨。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八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从 1958 年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年在建大中型工程项目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位数上升到千位数，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型项目。在这一阶段史无前例的探索历程中，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又在迅速走出困境的同时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经验，其中一些经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全面、客观地了解 and 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丰富内容，对于国史、党史、经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0 年底基本结束的三年“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试图摆脱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索。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成本的大干快上，“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改善了工业布局，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农业的严重减产和饥荒。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为了摆脱困境，1960 年底，党和国家对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1961 年开始，我国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进入了长达五年的调整时期。其中，1961—1962年为初步调整阶段，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体制偏差，强调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在农村，将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轻、重关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精简“大跃进”期间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关、停、并、转效益差的企业等。从1961年下半年起，为活跃商品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三类物资（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管理方面有所放松，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在工商企业，通过颁行《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办法，重新建立起规章制度和秩序。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

经过三年调整，渡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到了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这时受国际战争环境紧张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国防第一、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农业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国有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代替行政手段，例如试办托拉斯、推行经济核算、强调利润指标和恢复奖金制度；希望发挥市场调节的拾遗补缺作用，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这种思路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另一种思路从维护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出发，联系中苏两党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批评上述探索为修正主义。由于两种思路是在反复探索和实践形成的，其中穿插着大量的调查研究、典型试验，以及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干部思想革命化”、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等各种政治运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后一种思路在当时占了上风，为此后的“文革”作了铺垫。

抚今追昔，这些探索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供研究。通过阅读这批档案资料选编的内容，可以体会到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对于这些探索与尝试中的经验教训多一些了解，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而且对于现实与未来必将有所启迪。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与以往两批资料相比，第三套档案资料涉及的时限更长，内容更加丰富，数量也更多。全套丛书共计10卷，约1500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查阅了卷以千计、字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六载才编辑而成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

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学术资料。以往两套资料的出版，已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产生了一批有创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本套资料的面世，必将有助于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前两套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卷，编排成书；纲目设置原则为历史顺序和经济理论逻辑与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这项工作更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档案局、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2009年12月

凡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1949—1952年）、第二批（1953—1957年）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三批为1958—1965年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58—1965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X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确保材料精练，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分别采用全录、节录、摘录方式处理。凡采用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发文方文后不再重列；凡采用小部分内容节录、摘录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号。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号；凡为遗误字，在该字后面加〔？〕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部分国家机构采用简称（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分别简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中央批转文件的收文方部分省略。部分档案资料出处以数码代之。数字为建立档案资料的部门、单位或资料书的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

十、各卷附相关“要事年表”。

前言

武力

1958—196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经济体制变动最剧烈、经济发展起伏最大，也是经济工作最曲折的一个时期。因此，这个阶段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档案资料。

1956年底我国提前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底又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一是“一五”计划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但是，急剧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变革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二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问题和苏联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建设中的一些弊病开始暴露出来，这就使得“学习苏联”、将苏联的今天视为中国的明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中国如何避免苏联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病，不重走苏联经济建设所走过的弯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章、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建议和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的原则和办法，以及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文章，等等。但是，1957年国内的“反右”运动和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追赶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的浪潮，既导致了毛泽东改变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改变了八大确定的“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方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跃进”出现了。

应该说，“大跃进”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和党内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思想。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同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都严厉地批评了所谓的“反‘冒进’”问题，并指出反“冒进”的人与右派只有50米的距离了，完全否定了1956年中央政府对经济过热的必要调控，并且规定以后不许再反“冒进”了。这也是“大跃进”失误产生和不能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

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底基本结束的3年“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试图摆脱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自下而上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索。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剧烈的经济体制变革；二是超过实际能力的经济建设。

从经济体制变革方面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从微观上看，以“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取代了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了高度控制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甚至在城市也组织了部分人民公社。在国有企业方面，则实行了仓促的管理体制改革，即将原来由中央所有的企业大部分下放给了地方政府，有些甚至是层层下放。（2）在宏观上，实行了“两本账”和所谓的“积极平衡”的办法，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实际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打破了综合平衡。（3）在决策和管理体制上，无限扩大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责和权限，“党委领导、书记挂帅”取代了原有的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和企业管理层的经营管理。（4）以“运动群众”的方式（当时称之为“群众运动”），来替代有序的社会经济活动。

从经济建设方面看，“大跃进”则表现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成本的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结果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还导致严重的农业减产和饥荒。由于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在政治压力下实施的，因此导致地方党委和基层干部必然采取两种手段来应付：一是也采取同样的政治手段（包括制度）来推行经济建设；二是隐瞒、扭曲信息，采用虚假的手段（当时称为“浮夸风”）来误导上级机关。这两者都集中表现在“大炼钢铁”和农业生产方面。

当然，由于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政治动员发挥的热情，“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不小成就。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由于在“大跃进”期间，中央和地方在各个工业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到2 200个左右，其中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入使用的有1 100个。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约9万多个。第二，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了加强，技术水平有了提高。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由334.6亿元增长到721.8亿元，增长了1.16倍；工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由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增加1倍多。第三，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在工业总产值中，沿海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67.9%下降到65.3%，而内地则由32.1%上升到34.7%。第四，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60年，社办工业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虽然这些企业的大部分在调整时期下马，但是毕竟为后来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第五，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水利建设。虽然由于当时不能量力而行，半拉子工程很多，有的工程事前对水文地质勘测不够，草率上马，遗留问题很多，但这些工程的大部分经过修改续建，在后来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二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会后在全国掀起的“反右倾”运动，使得本来已经困难重

^① 汪海波、董志凯等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重的国民经济再次进入了1960年的“继续跃进”。不仅如此，在1958—1959年期间已经被证明是错误政策和办法，如高指标、强迫命令、“一平二调”、钢铁生产的“小土群”、农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城市人民公社等，又都再度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再加上自然灾害，从1960年开始，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严峻的局面，特别是严重的饥荒，深深地震撼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底党内很快就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一致意见。从1961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进入了长达5年的调整时期。

国民经济的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1—1962年为初步调整阶段，1963—1965年为继续调整阶段。

在第一阶段，就经济体制来说，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体制偏差，回归到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模式。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强调集中统一，以利克服经济困难。《规定》提出：经济管理的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在农村，将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保持了“政社合一”。就生产经营方式来看，1961年许多地方为了度荒而实行了“包产到户”，尤以安徽最突出。但是到了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则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纠正包产到户的浪潮。包产到户作为一种生产经营责任制被否定了。但是它能够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验，给党内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78年以后，它才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迅速推广开来。在城市，一方面进行企业治理整顿，通过颁行《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办法，重新建立起规章制度和秩序；另一方面，则通过重新集中权力于中央和强调“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跃进”期间下放给地方的企业，这个时期也基本上都收回到中央管理。

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尽快纠正经济建设所出现的严重失误，例如，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轻、重关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精简“大跃进”期间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关、停、并、转效益差的企业等。到196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其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扭转了前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国家财政扭转了前4年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在工业方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工业生产大踏步后退和退够的目的基本实现。1962年工业总产值850.2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395亿元，重工业产值455亿元；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42.5%提高到47.2%，重工业的比重相应由57.5%下降到52.8%；农业产值在农、轻、重的产值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4.5%提高到38.8%，轻工业由27.8%提高到28.9%，重工业由37.7%下降到32.3%。

三

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我国度过了因“大跃进”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后，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又再次凸显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实际上再次处在了一个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就经济体制来说，“大跃进”以前存在的两个问题（即宏观计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微观经济缺乏激励和自主性）比以前更严重了。就改革的思路来说，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此时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想法：一是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为代表的干部，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和调整时期的经验，认为农业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于国有企业，则探索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代替行政手段，例如试办托拉斯、推行经济核算、强调利润指标和恢复奖金制度；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希望发挥市场调节的拾遗补缺作用，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但是这些可能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产生冲击和消解作用的改革方向，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联系到中苏两党的思想和政策分歧，被当作修正主义受到批判。

在计划管理和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方面，问题也没有解决。例如，这个时期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当大部分。如由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从215种恢复、增加到40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此外，中央管理的农、林、牧、渔主要产品有30种左右，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主要零售商品指标有90种左右，其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进口商品有50种左右，进口额占进口贸易总额的90%左右；中央管理的出口商品有80种左右，其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央统一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200种左右，主要生活资料10种左右。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在1963年强烈要求国家计委实行计划改革；另一方面再次提出中央应该权力下放。

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阶段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首先，工农业结构得到改善。1960年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是4:1，到196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1，基本上接近当时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工业体系建设进步很快。这个时期，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发展较快，钢铁的自给程度达到了95%；能源工业也形成了煤炭、石油、电力三足鼎立的结构，长期依靠进口的石油，经过几年的油田开发建设，基本实现了自给；化学工业除了加快发展化肥、农药等产品外，还通过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特别是新兴的电子、原子能和航天工业也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工业部门。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生产原子能设备，只用两三年时间就于1964年、1965年研制出第一套原子能反应堆和核原料加工设备以及核物理试验设备；此外，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也有重大突破。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成功大大增强了国防能力，打破了美国和苏联对我国的核讹诈。

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来看，比例也逐渐趋于正常。“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1959年和1960年两年曾经分别达到43.8%和39.6%，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衡。进入调整

时期，因为大幅度削减投资，维持消费，积累率分别下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的10.4%和1963年的17.5%。到调整后期，又把积累提高到1964年的22.2%，1965年的27.1%，大体上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到1965年，我国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经过5年的经济调整和恢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生活消费品短缺依然严重，人均生活消费品并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在此期间，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的交恶、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的升级，都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加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过于严重，从而使得经济建设刚刚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刚刚推行农、轻、重的方针，就又转向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于对战争的估计比50年代还要严重，不仅建设重点过于向内地倾斜，甚至实行了部分企业从沿海向内地的搬迁。例如1963年开始继续实行全面调整时，提出的方针是“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但是到1964年，就要求全国的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战备的轨道，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战略后方建设，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又进行了一次战略转轨。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尽管我国在这个时期因苏联停止援助而更加强调“自力更生”，但是仍然想方设法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1962年9月，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纶设备，开始了我国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时期。1963—1966年，我国先后与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荷兰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的合同，用汇2.8亿美元。同期，我国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和单项设备，用汇2200万美元。两者合计3亿多美元。其中，成套设备50多项，用汇2.8亿美元，占用汇总额的92.7%。

正是在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的背景下，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发展，从一九六一年起，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后来影响颇大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

四

如前所述，这个时期不仅经济体制变动剧烈，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而且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和社会中矛盾重重，政治斗争和各种运动也是频频不断，这就使得本卷所收的史料不仅范围广，而且数量极为浩繁。由于受出版的字数限制，因此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去许多很有价值的档案和资料（部分保留篇目，以提供线索），尽可能保留精华中的精华，尽可能地录入那些从未公布的档案和资料。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本卷

的编辑设想、原则和办法作一些说明。

第一，从总体框架结构看，由于本卷是综合、计划卷，考虑到这个历史时期经济体制和运行的变动阶段性突出，因此将这个历史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编辑，即1958—1960年的“大跃进”阶段、1961—196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阶段；然后再按照经济体制和运行的逻辑，建立第二层次的编辑结构。

第二，由于这个时期中央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方针、政策的公开程度与前后两个时期相比，透明程度要高一些。很多基本的、重要的方针政策都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地方和专业刊物上刊登出来。因此，受本卷篇幅所限，对于这些重要、但是已经公开的文献，就不再收入，有些则仅提供篇目和出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卷忽视这些文献的重要性。

第三，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是本卷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计划的多变和计划文献的文字太长，加上计划执行中问题很多，情况复杂，因此这方面的选材就受到篇幅的限制，只能按照以下原则收录：（1）几乎每个计划都只能选用一部分概括性的文字内容；（2）对于已经公开的计划，则只录取篇目和出处；（3）对于地区性、部门性的综合计划，基本上不收录；（4）计划执行情况亦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处理。

第四，用政治动员和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建设，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大跃进”时期如此，即使在国民经济调整和继续调整时期，也开展了几乎不间断的各种运动，如反对“五风”、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增产节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运动不仅反映出当时党和政府为保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提高其效益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也从另一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经济体制的问题和经济运行情况。本想多收录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但是由于受篇幅所限，只能绝大部分割爱，采取只收入篇目的办法，为研究此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个索引。

第五，由于本卷为综合卷，几乎凡涉及具体问题，包括计划，都会形成与各卷的交叉、重复。因此，为了避免在篇幅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重复，对应该由各分卷收录的资料就不再收录或者列出篇目，因此，在查阅本卷的有关内容时，最好能够与各分卷对照。

本卷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其中，王桂玲、朱敏、王秀华、于孟、陈小枚、殷月兰、李小雪、乔咏梅等同志在档案资料的提供、审批和复印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劳动，课题组成员也给予了很大帮助，特别是姜长青、石建国两位同志，在后期编辑过程中，协助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分卷主编武力，编辑吴萍。

目 录

第一部分 “大跃进”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0年）	（ 1 ）
一、经济方针、政策、方法	（ 3 ）
二、人民公社情况	（ 42 ）
（一）农村人民公社	（ 42 ）
（二）城市人民公社	（ 78 ）
三、经济协作区	（ 97 ）
（一）经济协作区概况	（ 97 ）
（二）经济协作区的“二五”计划	（ 108 ）
四、“大跃进”运动	（ 129 ）
（一）“大跃进”的情况	（ 129 ）
（二）关于“大跃进”的一些看法	（ 157 ）
五、经济计划	（ 162 ）
（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期计划设想	（ 162 ）
（二）年度计划	（ 201 ）
（三）有关计划的问题和改进方法	（ 259 ）
六、有关经济工作的若干运动与机构变迁	（ 268 ）
（一）有关经济工作的若干运动	（ 268 ）
（二）机构变迁	（ 286 ）
七、社会经济情况反映	（ 302 ）
（一）1958年社会经济情况	（ 302 ）
（二）1959年社会经济情况	（ 313 ）
（三）1960年社会经济情况	（ 340 ）
第二部分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1961—1962年）	（ 351 ）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	（ 353 ）